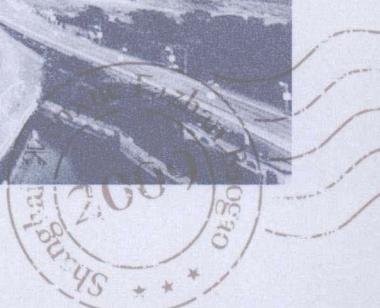


叶 辛 ◎主编

Shanghai Wenxue
Fazhan Baogao

上海文学发展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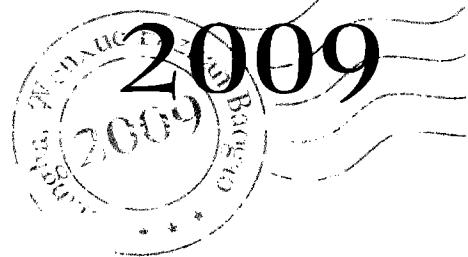
2009



叶 辛 ◎主编

Shanghai Wenxue
Fazhan Baogao

上海文学发展报告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上海文学发展报告.2009/叶辛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 - 7 - 208 - 08594 - 7

I. 上... II. 叶...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上海市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1291 号

责任编辑 齐书深 楼岚岚

封面设计 储 平

上海文学发展报告 2009

叶 辛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206,000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594 - 7/I · 674

定价 22.00 元

目 录

总报告

- 上海文学六十年 戴 翊[001]

个案——创作

- “十七年”上海工人创作的记忆与反思 郑祥安[020]

- 多元共生的上海城市诗歌 张瑞燕[035]

- 新时期上海知青题材小说研究 胡言午[054]

- 快城与快客——文学创作中的新上海人形象 沈 琼[068]

- 解构“怀旧热”:从城市文学作品中想象“魔都”上海 吴 珍[083]

- 酷儿文学中的上海城市意象 陈亚亚[100]

个案——刊物

- 《收获》杂志栏目设置研究 陆晓婷[114]

从民间书写到书写民间——试论《故事会》编辑思想的变化

- 毕旭玲[132]

先锋的位置:政治、文化与自我——从《上海文论》

- (1987—1992)看“上海文论”主体建构的可能性 王 进[146]

个案——市场

- 上海文学出版物竞争力研究 吴文娟[166]

个案——交流

从软实力角度看上海国际文化交流功能的培育

- 要 英 金 姬 王冷一[182]

总报告

上海文学六十年

戴 翊

提 要 本文简明扼要地总结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上海文学在创作和理论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对小说、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戏剧文学、理论等多方面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从思想深度和艺术特色等方面进行介绍和分析,使人们对于六十年来的上海文学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关键词 上海文学 发展 成就

—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在对旧时代污泥浊水的涤荡中,开始了建设与巩固新政权的工作,在努力恢复国民经济保障市民的生活中,也对上海的新闻、出版、电影、戏剧等部门在文学艺术各方面进行了整顿与改组,使上海的文学艺术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社会主义文学崎岖发展的时代。

从1949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为建国后上海文学发展的第一时期。在这一时期,上海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至1957年,上海文学开始直接地、全面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上海作家在翻身当家作主人的自豪中,抒写翻身激情、讴歌领袖、讴歌共产党、描写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成为文学的主要内容,也就成为此

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第二阶段，1957年至1966年经过“反胡风”“反右派”斗争，使作家噤若寒蝉，文学发展步履维艰，尤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在一次又一次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文学逐渐脱离了其本身的特性，“五四”新文学传统发生了断裂，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的艺术性日益不断被忽略；第三阶段，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文学更是走上了歧途，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工具，上海文学也就走向了沉沦。

历次政治运动扼杀了文学的生机，文学语境十分严峻和险恶，但作家们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和艺术探求，他们在当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在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的成就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的。

在革命战争文学的创作中，上海的许多作家都作出了成绩，其中，吴强的《红日》、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茹志鹃的《百合花》、巴金的《团圆》、菡之的《万妞》、艾明之的《火种》、阿章的《寒夜的别离》等是这一时期享誉文坛的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文学的佳作，为上海文学添上了绚丽的一笔。

《红日》以1946年底我华东野战军在涟水战场失利，1947年莱芜战役大捷，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74师为主线，在可歌可泣的革命战争场景中讴歌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峻青的《马石山上》、《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最后的报告》、《交通站的故事》等，都通过对革命年代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的描写，刻画了诸多为了革命事业浴血奋斗、勇于牺牲的英雄形象。峻青另有描写和平建设时期生活的作品，如《老水牛爷爷》、《山鹰》、《海燕》等，常常把战争年代的艰苦卓绝与解放以后的美好现实联系起来描写，突出了胶东人民在社会主义时期高涨的劳动热情和新的时代精神。

茹志鹃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主要为两类题材：一类为描写革命战争生活的作品，如《百合花》、《三走严庄》、《关大妈》等；另一类是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生活的作品，如《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春暖时节》等。她常常撷取战争生活长河里的一朵浪花、一片涟漪，加以精细的描写，讲述一些平凡人物的故事，通过生动的细节勾勒出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刻画出平凡崇高的群众形象。如《百合花》以我军前沿阵地包扎所里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揭示出生入死战争中的军民骨肉情。

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的成就，是当时的文艺方向、

方针所允许和鼓励的,所以描绘上海这段时期的社会变革,便成为不少作家的创作题材,周而复、艾明之、胡万春等人就是其中有影响的作家。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以建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题材,全景式地展示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历史和生活,是自茅盾的《子夜》以来描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又一部长篇佳作。作品集中描写在党的领导下工人群众与资本家之间的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展示了社会历史风貌,填补了当时文学的空白。

艾明之著有《狼窟》、《沉浮》、《火种》、《燃烧吧上海》等长篇小说和《阳光下》、《工人的儿子》、《阳光集》等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大多以描写工厂的生活为主,在反映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变革中表现出工人们新的精神面貌,并以激情洋溢的时代旋律、多种多样的性格刻画、叙事方式的多种尝试,展现出建国初期上海工人阶级新的精神面貌。建国初期上海曾涌现出一批产业工人出身的“工人作家”,如胡万春、费礼文、唐克新、郑成义、陆俊超等。他们大多在解放后学文化、学写作,在专业作家的帮助、指导下创作了许多小说、诗歌、散文和剧本,如胡万春的《骨肉》,费礼文的《成长》、《早春》,唐克新的《沙桂英》,陆俊超的《九级风暴》等,都显示了这些工人作家的实际和当时上海文学的一大特色。他们的作品大多描写工人在旧社会的苦难,在新社会的当家作主,在工厂企业里的生产竞赛、技术革新,表现了工人强烈的翻身感和主人翁态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城市和工人地位、精神面貌的变化。

在解放初期,上海戏剧电影文学的创作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夏衍的《考验》写两个老干部在领导工厂恢复生产过程中两种思想观念、工作作风之间的冲突,表现老革命在新任务面前所经受的考验;于伶的《七月流火》表现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熊佛西的《上海滩的春天》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劳资双方的矛盾冲突,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接受改造的过程;沈西蒙、漠雁、吕兴臣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写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拒香风毒雾腐蚀、密切联系群众、粉碎敌人破坏的故事;陈耘的《年轻的一代》,写上海青年人在革命前辈教导下克服糊涂观念、立志有所作为的思想转变过程,表现了“防止和平演变”的主题。这些作品在当时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尤以夏衍的电影改编成就更为突出。夏衍先后将一些小说名作改编为电影剧本,有《祝福》(改编自鲁迅的小说《祝福》)、《林家铺子》(改编自茅盾的小说《林家铺子》)、《革命家庭》(改编自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憩园》(改编自巴金的小说《憩园》)、《烈火中永生》(改编自罗广斌、杨益

言的小说《红岩》)等。

在建国初上海话剧创作中,杜宣的成就较为突出,主要创作有话剧《无名英雄》、《难忘的岁月》、《上海赞歌》、《动荡的年代》,电影文学剧本《长虹号起义》、《兰兰和冬冬》等。这一时期杜宣的话剧创作以“青春三部曲”(《难忘的岁月》、《动荡的年代》、《无名英雄》)影响较大。《难忘的岁月》以1931年到1935年间上海的抗日爱国运动为背景,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为主要内容,展现出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革命、不断成长的艰难历程,对国民党政府对日寇的妥协投降、对共产党的围剿杀戮作了深刻的揭露。《动荡的年代》以1937年至1939年抗战时期为背景,描述一支上海抗日救亡工作队从上海出发,去湘赣边区的坎坷历程,控诉了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活动的压制,也揭示出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和分化。《无名英雄》以1948年底至1949年的解放战争为背景,描写在上海地下党的努力下,策划组织国民党军舰长虹号起义的经过,展现出在白色恐怖中我地下党人员英勇机智的斗争。

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也有新的收获,如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巴金等人的《手》、聂凤智的《上海激战三昼夜》、吴强的《英雄的业绩》、魏金枝的《从天罗地网冲出来》、菡之的《我从上甘岭来》、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等。有的写革命战争,有的写新人新事,都包含着真情实感。

新中国成立后,儿童文学作家以翻身做主人的激情讴歌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时也以阶级斗争的观念表现阶级对立,在作品中揭露旧社会对劳动人民的压迫与摧残,反衬出新社会生活的幸福。洪汛涛的电影剧本《神笔马良》以神笔马良的故事,揭示了劳动人民在黑暗社会中的不幸遭遇,赞颂了与反动政权、贪官污吏斗争的精神。任大星的小说《双筒猎枪》描写贫苦农民的孩子的惨痛遭遇,谴责了地主阶级的惨无人道。胡万春的小说《骨肉》描写爸爸失业无力偿还印子钱,被迫将一岁多的小郁儿抵债,受尽打骂摧残,控诉了剥削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任溶溶的小说《我是个黑人孩子,我住在美国》把视角引向大洋彼岸,通过杰克的不幸人生,谴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费雷的诗歌《小雅得莲娜的故事》揭露美国电台广播员琼尼卷逃了听众给小雅得莲娜治病的大笔捐款。水飞的诗歌《小白杨》揭示出当时非洲黑人被奴役的状况。

许多儿童文学作家还以崇敬的心情回溯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不少作品描写了革命战争时期儿童的斗争生活,讴歌了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

如李楚城的小说《小电话员》、王世镇的小说《枪》、茹志鹃的小说《黎明前的故事》、卢大容的报告文学《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等。

巴金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出版了散文集《华沙城的节日》、报告文学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报告文学集《保卫和平的人们》、散文特写集《大欢乐的日子》、十年作品选集《新声集》、散文特写集《赞歌集》、散文集《倾吐不尽的感情》、散文随笔集《贤良桥畔》等。虽然在这十七年中，巴金也出版了《英雄的故事》、《明珠和玉姬》、《李大海》等短篇小说集，但相比较而言，散文更能代表巴金十七年创作的主要成就。巴金在他的散文中，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礼赞志愿军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反对侵略战争，呼唤世界和平，忆写朋友往事，寄托深切哀思，以其流畅的充满激情的文笔表现出巴金散文的独特风格。综观巴金十七年的散文创作，巴金以真挚充沛的激情、自然平实的结构、流畅朴素的语言等，构成了他散文创作真率激越的风格。火一样的热情是巴金小说创作的风格，也是其散文创作的特点。在《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巴金充满激情地礼赞建国十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用抒情诗般的笔触表达对伟大祖国的赞美。在《欢迎最可爱的人》中，巴金以激越的情感表达对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战士归来的欢迎：“我恨不得马上飞到鸭绿江边，站在成千成万捧着鲜花的人们中间，高声嚷着，笑着，呼唤着，歌唱着。”他赞美战士们的成长与进步，他期望归国的英雄们拿出英雄气概建设祖国。在《哭靳以》中，巴金以悲痛欲绝的语调，深切地表达对不幸早逝的友人靳以的哀悼。

十七年文学中，有些未发表的作品却道出了实情、抒发了真情，其中《傅雷家书》即以其真挚的情感、丰富的学识、深刻的哲理、流畅的文笔，构成了十七年散文创作中最为真诚、最为精彩的华章，形成了在那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极其难得的个人话语的空间。傅雷给儿子的信中始终教导儿子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真诚的人、坚强的人。“我始终认为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的是 Human(人)，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没成为××家××家以前，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的贡献”，以自我的人生经验教育儿子。反对恋爱至上，强调真理至上是傅雷一贯的观点，他在给傅敏的家书中说：“我一生从来不曾有过‘恋爱至上’的看法。‘真理至上’，‘道德至上’，‘正义至上’这种种都应当成为立身的原则。恋爱不论在如何狂热的高潮阶段也不侵犯这些原则。”在傅雷家书中，最多的是对于傅聪艺术成长的关心与指导，他认为：“凡是一天到晚闹技巧的，就是艺术工匠而不是艺术家”，“艺术是目的，技巧是手段，老是只注意手段的人，必然会忘了他的目的。”

在此时期的散文创作中有不少游记体散文，在对海内外的山水游记的记叙中可以见到颂歌式的抒情，抒发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的自豪感，如靳以的《北京的春天》、方令孺的《在山阴道上》、王道乾的《泉水在街上流》、罗稷南的《漫画长江》、吴良铸的《“中国布”》、造自的《海洋抒情》、桑弧的《云栖的竹和茶》等作品都在山山水水的描绘中洋溢着一种当家作主的中国人的自豪感。

上海的诗人们此时期的诗歌创作讴歌人民领袖和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建设、颂扬工农兵英雄形象，咏唱当时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成为建国初期上海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三毛哥的《向北京到北京》、张德洲的《最幸福的时刻》、赵莱静的《毛主席来到我们军舰上》、张佐的《千万颗星星绕太阳》、工人作家毛炳甫的《千言万语对党说》、罗海的《向日葵》、靳以的《祖国十年颂》、劳辛的《歌颂祖国的春天》等都确实以夹杂着个人崇拜的真诚的“感恩”情感，讴歌领袖毛泽东，讴歌伟大的共产党。建国初期中国人民全身心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诗人们便歌唱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福庚的《日夜灌溉》、白得益的《社会主义亲手造》、莎白的《验收》、肖星的《焊工站炎夏》、李汝清的《工地上的红旗》等，都热情歌颂了在建设祖国的各个领域里，人民都努力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的热情和干劲。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帜下，诗歌创作也努力颂扬工农兵英雄的形象，讴歌他们认真踏实的劳动态度、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和在平凡工作中创造的丰功伟绩，如陈毅的《参观蚂蚁啃骨头》、唐铁海的《三英雄舍命救锅炉》、仇学宝的《他是一个幸福的老头》、谢其规的《翻砂工》、李根宝的《十八姐妹》、于之的《感谢你》、邹绿芷的《为绿化近卫军歌唱》、黄宗英的《保育员之歌》、宫玺的《铁鹰飞上天》等。

在当时“左”的指导方针规范下，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中，上海仍然有着不少追求真理、敢说真话的作家、理论家，他们以大无畏的姿态继承了“五四文学”的关注人生、注重人性、强调个性的精神。

胡风于1954年7月22日当面向将《关于几年来的文艺实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交给当时任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的习仲勋，请其转呈政治局。这个报告的第二部分是核心，它深入地陈述了胡风的文艺思想，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强调现实主义应该包含人道主义精神，突出了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作品内容的真实性和人民性。第二，关于生活或生活实践问题，强调在日常生活、斗争实践中理解人、理解社会和描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与丰富性。第三，关于思想改造问题，主张“把创作过程看做是作家达到自我变革的终结性的实践过程”，并强调“真实的现实主

义的创作方法能够补足作家的生活经验的不足”。第四，关于民族形式问题，认为在文学上“民族形式本来是一个单纯而明确的概念：用民族的语言新鲜活泼地反映出了现实的真实，就是民族形式”。第五，关于题材问题，胡风深入地揭示了“不问任何作家，不问任何条件，都必须描写工农兵，尤其是必须描写他们的觉悟性，描写他们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描写他们中的先进人物”的题材决定论的危险性。

钱谷融在此时期的理论建树以人道主义文学思想为核心。他在1957年上海《文艺月报》5月号上发表的长篇论文《论“文学是人学”》，强调文学创作应该注重对于“人”的丰富个性的描写。钱谷融说：“我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里一共谈了五个问题，就是：(1)关于文学的任务，(2)关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3)关于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4)关于各种创作方法的区别，(5)关于人物的典型性与阶级性。我认为谈文学最后终要归结到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品对人的影响上。而上面的五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一点上统一起来了：文学的任务是在影响人、教育人；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就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好坏的一个最基本、最必要的标准，就是区分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主要依据；而一个作家只要写出了人物的真正个性，写出来他与社会现实的具体联系，也就写出了典型。”钱谷融将人道主义精神视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最低标准，认为伟大的文学家必然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钱谷融不满足于以简单化的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主观武断地分析人物，而强调对于人物复杂的人性的深入剖析，强调对于人物独特个性的观照。因此，在分析《雷雨》中不同人物的性格时，他尤其注重对于人物个性的复杂性、丰富性的分析与把握。

蒋孔阳此时期的美学研究主要围绕着美的本质、艺术特征、西方美学思想、形象思维等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唯物辩证法为理论支柱。他认为美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指出：“美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内容的感性形象，它具体地体现了人们肯定社会中美好事物的思想、意志、感情和愿望。”“美是普遍地客观地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中的。有生活的地方，就有美；有的地方，也就有美感。”蒋孔阳于1956年发表的《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长篇论文，对于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异同、形象思维的特征、过程及其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等问题作了十分深入的阐述。他认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都“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从感性的阶段上升到理性的阶段”，“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在于认识现实的方式不同。逻辑思维是通过概念的形式，从现实中个别具

体的事物中,抽象出它们本质的规律,以得出一般的法则。形象思维则是通过形象的方式,就在个别的具体的具有特征的事件和人物中,来揭示现实生活的本质规律。”关于典型化的方法,他强调说:“典型化离不开个别的具体的生活现象和细节,它是按照生活本身的形式来进行构思的,所以,典型化离不开个性化,个性化成了典型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二

新时期以来,上海文学的创作题材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都有了很大的拓展。面对新的现实和人们社会观、历史观、价值观的变易,激起了上海作家对悠远的历史的反思,创作了许多历史题材的作品,如徐兴业的历史小说《金瓯缺》,余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寒波的古代人物传记小说,叶永烈的现代人物传记,“花非花”历史小说系列,沙叶新的戏剧文学《陈毅市长》,戏曲剧目《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司马相如》及《开天辟地》等众多的影视文学等等。这些作品以宽阔的历史视域、新锐的历史观念、新颖的艺术手法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刻画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表现了中国社会、文化和人们心理的历史变迁。

当然,上海作家更关注的还是现实人生,现实题材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无论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派文学,还是90年代的新都市文学、新市民文学、留学生文学、女性文学、反腐倡廉文学,以及新时期以来一直保持旺盛势头的儿童文学、通俗文学等,其反映生活的适时性、深广度和艺术手法的新颖性,都使往昔的上海文学难以望其项背。

“文革”刚结束不久,当人们正抚着难以平复的心灵、肉体的创伤,愤怒申讨“文革”的倒行逆施,迎接新生活来临时,上海作家便敏锐地感受到了,并且以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1978年8月11日,上海青年作家卢新华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小说《伤痕》,几乎同时发表的还有郑义的小说《枫》,作品都控诉了“文革”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和心灵伤痕,揭示了“文革”毁灭人性的主题,标志着中国新时期以来第一个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伤痕文学”的正式开端。紧接着,宗福先等人发表和演出了话剧《于无声处》,揭露了“文革”中趋炎附势、卖友求荣的丑恶嘴脸,讴歌了敢与“四人帮”英勇搏斗的时代英雄,揭示了“于无声中听惊雷”的主题。青年女作家殷慧芬的中篇小说《早晨的陷阱》,表现了一代青年人生道路的坎坷,揭示了“文革”时期人们非理性迷

狂状态所造成的时代悲剧。“伤痕文学”表现的是那动乱时代的扭曲、悲怆、屈辱和困惑、探求的人生，抨击了极“左”思潮对人的心灵、肉体的残害，对亲情、友情的荼毒，以及人的自我的丧失、理性的泯灭、人性的扭曲，也倾注了作家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大愤慨和对人的命运的热忱关怀。

紧接着“伤痕文学”的“反思文学”，开始把批判的锋芒由“文革”引向更早的阶段。上海的反思文学不仅反思“文革”十年动乱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而且把深沉的思索伸延到“文革”前十七年乃至更遥远的年代，揭示浸淫于中国社会的病根和在这病根上所结出的恶果。

“反思文学”作品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过来人”的反思。他们大多是中年人，是数十年沧桑的亲身经历和耳濡目染者，因而他们的反思就更显透辟和深沉。茹志鹃的《草原上的小路》、《剪辑错了的故事》，可谓是上海乃至全国“反思文学”最早的代表作之一。黄宗英的《大雁情》、戴厚英的《人啊，人！》、俞天白的《氛围》等，都揭示了“左”倾路线和极“左”思潮给中国社会、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所造成的人性、人格、人道的异化以及人际关系、干群关系的变质变味，表现了作家对社会人生所作的理性思考和对人的价值、尊严的探索、追求。第二种是“归来者”的反思。他们中有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有被打成“右派分子”、“黑线头目”、“黑线人物”的作家，还有长期被贬谪80年代被称为“九叶派”的诗人等。他们“归来”以后，难免要对数十年来历次政治运动进行痛苦而深沉的反思。这种反思既有切肤之痛，又理性而深邃，对祖国和人民充满了信念和信心，常常洋溢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尤其是巴金的《随想录》，在沉痛反思“文革”的荒唐和非人道的种种罪恶的同时，还反省了自己在重重高压下思想发生的变异，并进行了真诚的忏悔，充分表现了这位老作家的自重、自律精神和毫不掩饰自己的忏悔意识，闪耀着高尚人格的熠熠光辉。第三种是年轻人的反思。如陈村的《死》、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李晓的《叔叔阿姨大舅和我》等。他们既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反思了年轻人在“文革”中的坎坷人生，又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对人生的感悟，以年轻人的心态体察上一辈人的境遇，反映了前輩人的不幸遭遇，和一些热血青年投身革命反被“革命”革了命的历史悲剧，表现了在社会大环境下许多人的悲剧命运。

上海的知青文学以青年人的生命意识，去观照从60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到80年代“知青大返城”这段历史时期知青们的坎坷、失落、尴尬、无奈的悲剧人生。上海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最多的城市之一，他们在农村的悲惨遭遇和回城后的尴尬处境，理所当然地引起作家的关注。上海的许多中青年作家本

身就经历过知青生涯，所以表现知青生活并兼写农村生活的作品就显得比较丰富。如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69届初中生》，叶辛的《蹉跎岁月》、《孽债》，竹林的《生活的路》、《呜咽的澜沧江》，彭瑞高的《贼船》，等等，有的深刻反映了上海知青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青春年华的虚度，人生理想的破灭，乃至生存权利、生命需求为那险恶的环境所不容，与“伤痕文学”相通；有的对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及其产生的主客观原由作了深沉的悲怆的反思，他们在“文革”后仍然难以医治的创伤，以及对知青自身价值、前途、责任的思考，又接近于“反思文学”。

叶辛和上海女作家竹林是中国最早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反映知识青年生活的作家。叶辛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和竹林的《生活的路》都是在1978年完成的。叶辛的笔触主要用在揭示知青中的优秀分子在迷茫中求索、在艰难中创业，坚忍不拔、决不虚度年华的可贵精神，体现出广大知青和作者自身的人生价值追求，如《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蹉跎岁月》等。在那是非颠倒、“造反”横行、许多下乡知青陷于迷茫而浑浑噩噩之际，他们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脚踏实地地艰苦创业，显得难能可贵。《孽债》是一部纯粹的“后知青小说”，在中国当代“后知青小说”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竹林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的价值，不仅在于较早地披露了中国农村的极度贫困和知识青年的悲惨遭遇，而且表现在她对两个主要人物——知识青年张梁和娟娟的人生道路和价值观所作出的不同评价。娟娟面对极度贫困的农村感到失望，想尽早上大学脱离农村，这本来是许多知青的共同愿望；问题在于她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竟然违背了做人的起码道德良知，去巴结现任党支部——一个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野心家崔海赢，听从他的指使，昧着良心写材料给坚持改造良田、抓好生产的老支书扣上用生产压“革命”，破坏“批林批孔”的帽子。这样越陷越深，终于被引上了绝路。作者在贬斥这个人物的人生价值观的同时，又在另一个主要人物——怀有强烈责任感努力改变农村的极度贫困，让乡亲们走出赤贫的张梁身上，寄托了自己对青年的热切期待。出版于1995年的长篇《呜咽的澜沧江》（又名《女性——人》）对知识青年悲惨遭遇的描绘达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但更重要的是作者并不拘囿于揭示极其艰难的生活，而是表现了当时知青中的优秀人物对“文革”、对知青运动、对人性、人类爱与人生价值的思索。他们能够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不顾个人的安危，冷静地思考国家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这种沉重的形而上的问题，尤其难能可贵，也表现了竹林在知青文学创作中的独特思考和贡献。

彭瑞高的长篇小说《贼船》，以清醒的生命意识，去逼近和观照作为历史的知青生活，着重表现了三个充满自然欲求的活生生的知青。但他们起码的生命需求同那个可诅咒的时代环境是如此不相容，以致各自都不得不走上了“贼”的道路，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灵与肉、人性与非人性的冲突图景。

新时期是改革开放的时期。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便开始了“改革文学”的滥觞。上海是改革的前沿，上海的作家也全心全意投入改革的时代潮流，但他们不是一般化地记叙改革的过程和事件，而是深入人们心理的深层，表现人们在改革开放中观念、心态的变化和新的精神风貌，揭示时代在人们内心激起的波澜。赵长天的《伽蓝梦》可说是概括了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在不少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惶乱心态。因为一个莫须有的“新发现”，为了追逐金钱，庞大的社会机器盲目地疯狂运转起来，结果酿成了巨大的损失。

俞天白的长篇《大上海沉没》，把上海改革开放还相对滞后那一特定年代上海市民的封闭心态，归结为“衰弱人综合征”，具体表现为以“老大自居”，“先前阔”的阿 Q 相和急功近利、讲求所谓“实惠”的短期行为。作品意味深沉的生动笔触中饱含着作者深深的忧虑。《大上海漂浮》中的环球证券公司总经理沈笑澜、《金环套》中的华茂公司事业部部长林洁、《大都会》中八茂经济开发公司总裁褚婉敏等人物形象，都是在经济改革浪潮中初显身手的弄潮儿，他们的心绪和拼搏，展示着时代的风采和诸多社会历史内涵。殷慧芬的长篇《汽车城》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不同的质量观念所引起的激烈冲突，高度评价上海俊友汽车公司坚持的质量是企业生命的精神，体现着作者对现代企业发展的科学眼光。描写改革者，不一定要很多地具体地描写其改革措施，而应当多方位地展示其精神世界。陆星儿的长篇《痛》，描写了一位名叫邱大风的干部，在改革中的经历和遭遇，在其内心的挖掘上下了功夫。这是一位有着“年轻的心，滚烫的血”的事业家，他把“实现自我”的雄心与国家的改革大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作品并不过多地描写他的改革措施，却全方位地展示其精神世界，所以这个人物形象给读者的启示也是多方面的。王小鹰的长篇《我们曾经相爱》，昭示改革的意义不但在于发展生产和经济，也在于围绕着改革所引发的观念冲突，从人的自我实现和发展这一视角启迪人们反思历史，思索人生道路的价值观。

中国女性的人生，她们的真实处境和初步觉醒、积极奋争，曾是“五四”以后新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如王小鹰的《新嫁娘的镜子》、《星河》、《春天的踪迹》等小说，着力表

现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生态和命运,表现她们为实现自身价值所付出的难以想象的努力,启迪人们对耗尽女性生命力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作批判性的自省。而长篇小说《你为谁辩护》则更深刻地揭示普通女性在生活中的实际处境。王周生的《性别:女》又进一步通过母女两代人的独立意志、人格尊严和情爱、性爱遭到无端压抑所造成的生理心理的变异,以及她们性别意识、自主意识的觉醒和抗争,指出只有妇女得到真正的独立、解放,人格尊严得到尊重,男人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和幸福。陆星儿则把视线主要对准在各个岗位上的知识女性。《女律师的故事》通过女律师伍玉辉的惨淡人生,揭示不健康的社会文化心态给妇女带来的苦难。这位在司法界卓有成绩的女律师,就因为追求真实的生活和正当的爱,而长期被歧视、遭迫害。要不是她身体里那股扑不灭的生命之火和人生的信念,她真是早就要被吞噬了!《一个与一个》中的女工程师华青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女性人生的范本。华青在事业上和个人生活中都有着知识女性的成熟和自信力,这种理性的追求和爱的力量所带来的色泽鲜亮的人生,显然已经有了新时代新女性的特色。竹林也是一位对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知青女性的现实处境和心态、命运极为关注的作家,从她的第一部长篇《生活的路》开始,她几乎是不间断地写了《苦楝树》、《女巫》等大量揭示女性的遭际命运的长、中篇小说。在她的作品中,女性所面对的往往是整个社会习惯势力的压迫,无论她们如何抗争、挣扎,也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作者通过这些女子的悲惨遭际,向整个社会习惯势力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女巫》中的须二嫂、赵婆婆、知识青年叶樱等女性,都无不在肉体上、经济上、人伦上受到须阿柳家族的摧残和迫害。通过钻营当上族长、村长的须阿柳,利用手里的权力奸淫过多少个女子,并且把她们逼上死路。作品主要人物须二嫂三代被迫害凌辱,又复仇无门,只能用巫术来诅咒须阿柳,成了“女巫”。此外,王晓玉的长篇《紫藤花园》通过两个女性的性格对比,揭示了人物丰富的内心生活,表现了作者鲜明的伦理道德观和价值判断,寄寓着作者对女性社会伦理的人文关怀。

1985年开始的“寻根文学”勃兴之时,上海的作家从文学的背景上观照人生、描写最普通的人生现象,从而透露出深层的文化内蕴,因而既是人生的,又是文化的,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王安忆的《小鲍庄》表现了作家在这方面的探求:“小鲍庄真是个重仁义的庄子,祖祖辈辈不敬富,不畏势,就敬重个仁义。”大家讲仁义,仁义为大家,无论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小鲍庄却始终是一片宁静,在仁义的道德氛围中过日子。“仁义”这两个字,概括了中国人传统的群体意识、人生信念和道德氛围。在这种血缘亲族关系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群

体意识支配下,庄子里的人们敬老爱幼、相互扶持;但对稍有一点“越规”的要求,如寡妇的恋爱、青年人自主的婚姻等,则群起而攻之。王安忆的《舞台小世界》也揭示了传统文化心态和它的社会基础,以及它在生活中形成的无形的“怪圈”,这个“怪圈”暗示着转化传统文化负面影响及其社会基础的艰巨性、长期性。沈善增的长篇小说《正常人》表现和解剖的是普通中国人生态和心态。在“我”的家庭里,在尊老爱幼氛围里洋溢着崇古守旧、敬天畏神等心理;透过人物不同的个性,人们又分明觉察到那种温情脉脉的实用理性主义的心理模式。孙颙的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雪庐》、《烟尘》和《门槛》,虽不是纯粹文化意义上的小说,却揭示不同时期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足迹、命运,追寻了他们血泪史、报国史的价值理念和精神面貌之“根”。王小鹰的长篇《丹青引》,可谓新时代的《儒林外史》。小说揭露一些知识分子在名欲驱使下泯灭良知、欺世盗名,处心积虑地压制和摧残他人发展的丑恶现象,无情地撕下他们各种冠冕堂皇的伪装,拷问他们的灵魂,端出他们在名利面前尔虞我诈、六亲不认、丧失良知和人格的可鄙嘴脸。这也是一种“根”。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上海出现了经久不息的“留学热”、“出国潮”,有大批青年人出国留学。其中有些文学爱好者有意识地创作了一些新型的留学生文学,有些文学刊物还开辟了留学生文学专栏,使这种文学在上海形成一种风气、一种特殊的景观。这种留学生文学大致有两种形态。一种表现“出国潮”中一些青年人千方百计谋求出国,经历千辛万苦等待签证的急切心情和留学生出国后其家属的艰难境遇、失落的心态、家庭的变异。前者如程乃珊的《签证》,张重光的《请高抬贵手》等;后者如乐美勤的《留守女士》,张献的《美国来的妻子》,沙叶新的《东京的月亮》等。另一种是直接描绘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留学时生活境遇的作品,主要有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王周生的《陪读夫人》,薛海翔的《早安,美利坚》,樊祥达的《上海人在东京》,陈丹燕的《纽约假日》等。《我的财富在澳洲》写主人公“我”盲目辞去公职到澳洲“闯关东”,吃尽千辛万苦的全过程。作品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初到澳洲时的举目无亲、孤独寂寞,找工作的万般艰险,找到工作之后所承受到的残酷压榨;也描写了打工者与雇佣者之间的纷争。《上海人在东京》也侧重描写了中国留学生血泪斑斑的打工生涯,但把触角渗透到人物心灵的深处,揭示了这种打工生涯对人性的戕害和扭曲:“东京教会了我抗邪恶,在被‘人’吃的时候,去‘吃人’。”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心悸的人生体验呀!王周生的《陪读夫人》则不再把笔触停留在个人际遇、奋斗和感慨上,而是落在人性的冲突,人际的沟通,